

上世紀的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不僅“批林”還“鬥孔”，不知道為甚麼把二人連在一起，成為“今古奇觀”，或許是誤被檢舉，說是“孔林”藏有問題，所以要奪孔子的權，追貶孔子，還要拆孔廟，破孔墓。聽說是因周公幫忙，救了老人家未受鞭屍，也救了政府，使今天能有“孔子學院”遍地開花，還能把“大同”老招牌亮了出來。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 禮運·大同篇

上一世代的人，經過工業革命，科技空前的發達，本該安居享受好生活，可在二十年之內，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以原子武器的集體屠戮結束。使人看到科技沒有用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被誤用於毀滅同類的人。當時聰穎的政治家們，知道科技可用以為善，也可用以為惡，這巨大的力源，如果失去正確控制，人類前途，將存在極大的隱憂。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結束時，倡議建立聯合國。中國是聯合國創立者之一。到戰後聯合國組織正式成立。當時的國民政府，把表述人類最高政治理想的禮運“大同篇”，鐫刻在大理石上，贈送給聯合國，作為“治世之寶”。可是，此後仍然未能阻止戰爭的發生。而贈石的那個政府，因並不曾以“大同”為職志，被聯合國定為“不存在”，連累所贈獻的石頭，也被剷除。

原來人類的戰爭，起源於內心缺乏愛，因而產生嫉妒，仇恨，和貪念。人心靈的情況如果沒有改變，互相殺伐，即使回復到原初只有兩個親生弟兄，也不能免於骨肉相殘。當年該隱的世界，若他見到與兄弟亞伯，可以互相協作，建立那麼廣闊的世界，豈不比相爭好得多？無論如何，人類歷史是一部戰爭紀錄，圍繞着獨夫血染的寶座，和軍隊的營帳；那不僅是殘忍，也是短視和愚昧的最低劣表現。

在古老的詩經，流露出人民的意願，大雅中的“民勞”，是當年召公伯虎，教導周厲王姬胡的話，充溢智慧的光輝：

民亦勞止 汙可小康 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
无縱詭隨 以謹无良 式遏寇虐 憚不畏明
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 汙可小休 惠此中國 以為民逌
无縱詭隨 以謹憚恤 式遏寇虐 无俾民憂
无棄爾勞 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 汙可小息 惠此京師 以綏四國
无縱詭隨 以謹罔極 式遏寇虐 无俾作慝
敬慎威儀 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 汙可小愒 惠此中國 俾民憂泄
无縱詭隨 以謹丑厲 式遏寇虐 无俾正敗

戎雖小子 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 汙可小安 惠此中國 國无有殘
无縱詭隨 以謹繾綣 式遏寇虐 无俾正反
王欲玉女 是用大諫

詩經·大雅“民勞”

試用現代的話，大概可以說：

人民夠困苦啦 亟需略得安舒 中央因以得益 四方也就蒙福
勿任表面唯諾 要防惡劣殘酷 停止強取豪奪 公開一無所懼
溫和以求親民 王權安定無虞

人民夠困苦啦 亟需略得養息 中央因以得益 也是普遍民意
勿任表面唯諾 要防多言爭議 停止強取豪奪 勿使人民憂疑
不圖自己安逸 作為君王福祉

人民夠困苦啦 亟需略得喘氣 京都因以得益 四國也得平息
勿任表面唯諾 要防貪得不止 停止強取豪奪 勿使奸惡洋溢
保持莊嚴有禮 親近行善君子

人民夠困苦啦 亟需略得憩安 中央因以得益 人民減少憂患
勿任表面唯諾 要防邪惡凶殘 停止強取豪奪 勿把正人抑貶
你雖年輕識淺 應該立志致遠

人民夠困苦啦 亟需略得休養 中央因以得益 國家全無損傷
勿任表面唯諾 要防淫佚蔽光 停止強取豪奪 勿使正人失望
王好美人女色 尤須力戒莫忘

今天常說的“小康”，是略可安樂富裕的意思。這現在被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實在可以稱為“儒家社會主義”，起源於歷史上名臣召公伯虎，進諫專制暴君周厲王(678-828 B.C.)姬胡。簡單來說，也就是和平政策。和平的先存條件是不同，允許不同的存在，才会有和平。真正追根溯源，社會主義就是和平主義，經過各色鬥爭，後來共存協和。周厲王年輕即位，貪利好色，揮霍無度。為了弄錢，施行“專利”。所謂“專利”，實在是橫徵暴斂，任何天然資源都要徵稅；其作法同於強盜掠奪百姓，絕不應如此。大夫芮良進諫說：你願聽倖臣榮夷公的話，國家前途可憂。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無奈厲王狂妄愚昧，而且好利，所說的“專利”，不是像今天的發明專利，是統治階級把持天然資源，不讓人們取得，寧讓“貨棄於地”。君王應當與人民上下共利，而不是上下交征利，這樣必然危害國家。但厲王簡直就如史稱紂(辛)的複製。商末代王辛被給了“紂”的惡諡，因為他“殘忍捐義”；但史家郭沫若，仍稱其有開發國疆等建樹。可是周厲王在奪取人民財利之外，還要加上強制人民去服勞役，以至國力疲敝。見百姓偶聚在路邊談論，互吐苦水，就以爲要陰謀對付他，派類似東廠的特務窺伺，抓來懲罰或處決；箝制人民言論自由，施行暴虐統治，固執愚昧。三十四年在位，他竟然變本加厲，以人民為草芥，任意虐待。召公告訴他：人民受不了了。但他拒絕改革；惡行不改，政策不改，老百姓只好起來進

行改政府。百姓受夠了，一齊起來反叛。那獨夫逃到彘地；群眾還想殺掉他的太子，好斬草除根；太子藏匿在召公府上。召公以為作臣子的，可以怨君主，但不應該有恨；為了延續社稷，把自己的兒子裝作太子，交由造反的群眾處決。人民接受召公和周公執政，稱為“共和”。無論如何，共和政府不願武力統一，使人民受禍害，讓偏安一隅的小朝廷自生自滅。

十四年後，長期統治而後逃難的厲王崩逝。太子也已經長大成人了，召公和周公，就名正言順的協力扶太子登上王位，是為周宣王。時在公元前 827 年事。*

這個周厲王姬胡，很似是聖經中的猶大王羅波安。智慧的所羅門王，偏有羅波安那樣的兒子，愚而剛愎自用，不知道謙卑聽從老人智慧的話，為人民服務，“服事這民如僕人”（王上一二：7 代下一〇：6-19），這是超越時代的智慧。只是王喜聽信近臣的好話，以為自己高高在上，威嚇百姓事奉他，作孤立的偉大睿智英明的最高領袖，結果失去大部分國土；想用武力光復統一，結果更遭失敗，其餘生無奈只得雌伏（代下一二：1-14）。

正如舊約時代的先知預言，多用詩歌體裁；“民勞”的諫言，也是用韻文，所以稱詩入經，或說大致像後來的銘體文，為了容易記憶。首先是人民的期望；再則特別叮囑“勿縱”，“要防”，和“停止”三大項，予以重複，表示十分要緊。

這賢臣召公，真可謂忠君愛國的典範。他不惜犧牲自己的兒子，代替厲王的兒子，以平民憤；然後他還扶厲王太子，繼承了王位。

可惜，召公的改革建議，沒有蒙接納施行，成為歷史上的遺憾，誰都無法更改。但至今仍然是有其價值。今天的領袖，問題仍然發生在“專”上，甚麼都要一把抓，作之君，作之師，必然沒有好結果；任何團體的領袖，都應該參考。眾人的事務，必須改革開放，才是正當的道路：

開放言論 “防民之口，猶如防川”。不僅無法禁止人們講話，還應該勤徵民隱，鼓勵百姓講話，各階層不同的人士，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方式，提出他們各自的意見，以作為施政的參考。召公指出歷史上早有制度，設置官員，作的就是這樣的工作；人君應該求賢若渴，還該要求諫若渴，真實聽取人民的聲音，才可為民服務。“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論自由是好事，只怕求之不得，哪可迂執拒絕？召公說的是忠君慮國的諍言，可惜昏王不肯聽從。

開放經濟 愚昧的領袖，以為“朕即國家”採取專利，專賣，國有，國營，實在就是與民爭利，特別是作為聚斂浪費的財務來源，只讓自己那一小撮人享受，誰也絕沒有辦法維持長久，是很不智的手段。大夫芮良夫進諫說：“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勸他不要聽信榮公逢迎的話。這真是良言逆耳，但他聽不進去。許多年之後，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所以開放工商業，可以富國利民。

開放國政 大夫芮良夫和召伯虎所說的，都是有關國政的問題。國政必須得選用賢與能，事務國民公決，不能任由小人蒙蔽。“毋縱詭隨”，是說不要讓唯諾假意的人，詐欺偽作服從。此類人不誠自然就不忠，心地狹窄，只知道排擠不屬於他一黨的人；如果給他們包圍，就無法見到光，

無從聽到真話，看到真相，成爲又聾又瞎，不能作正確的選擇。這樣是很危險的。古時所謂“小人”，常用來指一般平民，並不一定是壞人：他們是心小，沒有胸襟，只想到自己：如果晉升到掌握決策階級，極有可能發展成爲壞人，壞大事。君子能夠容讓別人，想到別人，所以他們不是任人唯親，而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才是利民利國。

個人和社群不是對稱的。我們只能有社群中的個人。所以“獨夫”不是與社群對立，也不是一個階級。人民革命的期望，是要改革周厲王的暴政，使社群得到自由。然後，產生階級協和的新政權。

後世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提出“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缺乏之自由，免於恐懼之自由”，是人生存的基本條件；在任何地方，人民缺少了其任何部分，就不能維持其所以為人的尊嚴與價值。這與“小康”社會的理想，大致有相同相通的地方，任何的政府，都應該維持。

“民勞”一篇所說“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都不過是進至大同之路，建議政府，注意人民的意願，同情他們的疾苦，偃兵息武，讓人們得安居樂業，休養生息，發展經濟；又說：這不僅可以使國家人民受惠，還可延及四方，四國。惟有和平發展，略可使百姓安舒，享康樂，富裕的生活。如果誰想要一網打盡所有的魚，那是狂人的妄想，必然會網破魚失。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持久不息的窮兵黷武，而不疲敝。惠國惠民的道路，是抑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想控制別人，要尋求和平，休憩；理想的中央政府，就是所說的“中國”，在洛陽平原，不施行中央集權，而讓四方人民安樂富裕。“小康”社會，是進到大同的過渡時期。

古巴比倫擴張私慾，用各樣方法，對付所轄的人民，“用鈎鈎住，用網捕獲，用拉網聚集他們；因此，他歡喜快樂，就向網獻祭，向網燒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分，和富裕的食物。他豈可屢次倒空網羅，將列國的人時常殺戮，毫不顧惜呢？”(哈一:15-17)這描述巴比倫發明了一系列最古老的“漢謨拉比法典”，大小的鈎子，各類的網，叫人民陷入其網中；然後，統治者就得意，誇口，崇拜他們的無所不用其極的組織和方略。

中國歷史上的秦，精兵強國，用商鞅變法，繁複羅織的苛法，使天下被網羅；最後連制法的商君，也法網難逃，結局成爲諷刺性的悲劇，“作法自斃”。不過，秦國的強大好戰，已經奠定了殘暴統治根基，雖然後來滅六國，一統天下。但英武聰明的秦始皇帝，建立的政權，只延續了十五年(221-207, B.C.)到二世而亡；後來紀錄還有僅維持一二年，當代失國。

羅馬帝國就是因無厭止的擴張，其“網”終至不能維持本身的重量，而導致破裂滅亡。網的作用是收，儒家社會主義的理想是開放。今天的當政者提倡的“一帶一路”，就是以開放為方向，而求人類社會共存共榮。

聖經的中心是自由。舊約以色列人出埃及，得到了解放自由，不再作奴隸；但他們的生活表現，並不理想，背道悖理，終於被擄滅亡，是忘記神的結局。耶穌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八:31, 32)在美國，有些古老的大學，把“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Veritas vos Liberabit*)或“真理”(Veritas)，銘刻在校門或圖書館門上。可惜，進出校門的人，追求瞭解的是物理，缺乏人理；得到的爲所欲爲的自由，沒得到不為所不為的自由。這聽來很有些像早期的保羅：“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七:18)所不同的是，他們連“立志為善”的想法都沒有；因爲今天的教育，不教導道德觀念，就缺乏如何立志，是人類很不幸的事。

因此，人類的盼望在於耶穌基督。耶穌所講“浪子歸家”的故事，不是教導社會革命，而是從個人的改革開始；不需要推翻所有的牧主，解放浪子得自由，從牧豬奴隸階級成為作主的人，而是要牧豬的浪子個人從心裏悔悟，回家見父親，恢復家庭的協和，社區中也得回了一個有積極貢獻的正常分子。這樣，就應該全社區一同快樂(路一五:17-32)。這是耶穌的社會主義與眾不同的地方。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從天降世為人，在十字架上為人的罪流血受死，而且在第三天從墳墓中復活，使信祂的人得稱為義，作神的兒女，“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彼前二:24)信祂的人得成為神的兒女，便與基督同為神的後嗣(羅八:14-17)，要承受神永遠榮耀的國。等神的國度臨到世上，那將是永遠和平的大同世界。哈利路亞！

* 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

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史記·“周王紀”)

儒家社會主義資本家—子貢

社會主義資本家，把兩個不同世界的名詞放在一起，如果不覺得矛盾，就不免是牽強附會。其實，只要曉得，所說的“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可以融會貫通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儒家的社會主義，如果真有這種事，就必然曾有這樣的人。他就是孔門弟子端木賜，字子貢，衛國人。子貢比孔子年輕三十一歲，生在一个商人家族；十七歲從學於孔子，後來出仕，後來經商，仍不廢學。他是孔門語文科最優秀者，善於雄辯，被稱“孔門十哲”之一。他的政治才幹非常出色，“有幹濟才，辦事通達”，曾任魯，衛，兩國相。子貢善於國際貿易，富致千金，成為孔子弟子中首富。司馬遷認為孔子的名聲之所以能布滿天下，儒學之所以能成為當時的顯學，其中子貢的推動“貢不可沒”。

子貢在理財經商上的卓越天賦和成就，論語“先進”孔子曰：“賜不受命，而殖焉，臆則屢中。”是說：子貢不坐待天命，經營製造機會，常是臆測成功，增殖財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家累千金”，是說：子貢善觀察市場行情的變化，人廢我舉，得以獲利，以成鉅富。由於子貢在經商的成功，在“貨殖列傳”復表彰這位商業鉅子，肯定他為經濟發展的嚆矢。

作為儒商鼻祖，子貢有其最與眾不同的特質：

一 謙卑求進

有一次，孔子問他與弟子顏淵比較誰為優勝，讓他自己打分：“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可見他有自知之明。不過，聞一至二已經很不錯了。表明他知道自己能夠掌握原則，接受啓發，容易進步，前途希望可以遠大。

到他學習一段時間了，子貢讓老師考核。孔子衡量子貢，給這個弟子很高的評價—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意思是對他極為器重；“瑚璉”，也就是“簠簋”，是宗廟的重器；如果通俗一些說是富貴，也該差不多，而且是大富大貴。史記“貨殖列傳”：“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舉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

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无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人必須謙卑，才可進步。看另一名排名還在子貢前面的演說家宰予，白天睡起覺來，夫子說他是“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有人以為是“宰予晝寢”，是在寢室壁上畫，引起“糞土之墻”的評比。無論如何，二者都是不求長進的表現。孔子另外批評弟子冉求，只貪利助季氏豪門搜刮民財，還推說：“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自然知道他的藉口，就明指說：“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是說你連試行都沒有，如果學不來，至少會半途而廢，你是畫地自限。

一 能學有識

端木賜拜了孔子這位傑出的老師。孔子不僅懂得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更是“聖而時者”。為以後經商打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對於經商，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和“義以求利”。他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富貴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說：“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端木遵循夫子教導，在儒家觀點的“義”和商人的求“利”之間，接開了溝通的渠道；不像後來的孟子見梁惠王，說“何必曰利”，在世人和“仲尼之徒”的理想之間劃上了鴻溝。無疑的，孟子的雄辯，似乎更勝於子貢，但子貢的和協寬仁，頗為可取。論語記載子貢問學於孔子多達二十多處。從修身，為政，處世交友，論人，不一而足。而且他所問的問題都很實際，是先經過深思的。他不像樊遲問吃飯，種作，簡單又膚淺；自然更不至於愚昧荒唐。子貢的問題，都有啓發性，以至於孔子的回答成為經典。論作人：“言必信，行必果”；“貧而樂，富而好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至近於耶穌“金律”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立信：“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論治學：“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論人品：“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過猶不及”；立身：“行己有耻”；論到治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都是出於子貢提問孔子作答。

至於“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則更為高明，是大企業主管不可缺少的條件。孔子說：“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智]？”這是說，智者必然擇好鄰居。不僅說到選擇居處要有智慧，更應當分辨是非善惡：“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因此，孔子說的話：“吾道一以貫之。”同一原則可以知人善任。（論語“里仁”）同樣選擇用人的原則，企業管理主要是安排管理人，“德不孤，必有鄰”，學得能夠識人，才有健全的企業。屈原楚辭的“卜居”，所說的也是人事上的居甚麼“位”；不僅懂地緣，更得懂人緣，始可以成大功，立大業。

友鄰，睦鄰的道理，值得特別注意。處人或營商，都應該持寬仁的存心行事，不要排擠；對外，不可排鄰仇外；對內，不可擠鄰內爭。中華民國的先知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留下的遺囑，被人像念咒般公開念誦多年，但不求其端，不詢其末。甚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內容是甚麼？沒人過問研究。並且斷章取義，說：“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仍須努力”，閉目否認革命已經“成功”民國建立了十幾年的史實，解釋為應該努力以求建立會黨式的狹隘軍閥“一言堂”，因此，思想錯，行為誤，形成中國二十世紀的大悲劇，多麼可惜！

一 善於言辭

子貢擅語言表達。史載孔子的弟子：“受業者七十七人（又有說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

”子夏問孔子：子貢之為人奚若？“夫子說：“賜之辨賢於丘也。”（列子“仲尼”）可見其語言表達能力之強。他不只是知道如何說，而是知道說甚麼，才更要緊。知道在甚麼時候，該說甚麼話。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困於陳蔡，絕糧。孔子夷然處之。但顯然該找個解困的辦法。子貢覺得該有所作為。

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

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

使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子貢出馬，找上了就在左近駐軍的楚昭王。楚為禦吳救陳的強大軍隊就在城父。昭王本來就對孔子甚為景仰，聽子貢的言辭，表示他有意以武力對付陳蔡，他們哪敢違逆，立刻恢復了孔子游學團體的完全自由。

不僅如此，子貢說諸侯存魯的功績，尤為出色，甚至可說影響歷史。那些領袖們雖然水準不怎麼高，但無一是傻瓜，又各有謀臣，他們都肯對於子貢言聽計從，是因為端木老板善於分析人的心理，又善於分析事理，並盱衡局勢；講話高明，或許有時會只說一部分；但迎合各人貪利的心理，所以能夠得人聽從他。我們看他見人先說大道理，設定對方的好處，人都容易聽得明白；被說的人先就想接受，說：“善。只是...” ，他再把那小難處弄通，他們都大悅，聽話，事情就好辦了。這正是孔子所說：“行己有恥，使與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

一 結合政治

子貢的商業規模相當宏偉，用今天的話說，可稱為跨國企業。在複雜的國際局勢下，只靠打算盤，即使有名校的MBA也是不夠的。孔子說到子貢“好廢舉”。他善於取得並分析政治經濟情報，而善加利用。大概他是從空中學來的。“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這從一件成功的外交紀錄中可以證明。

齊國的權臣田常，聚兵計畫要伐魯。情形很危急，孔子召集弟子說：“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國難當頭的時候，失業的孔子，放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原則，為了祖宗廬墓所在的魯國，解決危機。史書載：顏淵自告奮勇，願意出使，夫子知道他雖然聰慧好學，但不是擔當實際政治任務的適當人選；勇敢的子路想要去，孔子也知道不是去打仗，子路一定搞不通；最後子貢表示願意上路，孔子選擇委任他處分這給問題。子貢用釜底抽薪的思維，先去見田常；藉田常的引見，得到齊王的囑託，代表齊國訪越國；齊國本是吳國的親家，卻願意站在越國一邊，越王勾踐自然歡喜，親自出到郊外迎接；越王了解這戰略，差大夫文種同子貢兩人訪晉國；晉國同意助越。這樣，勾踐得以實現其滅吳復仇的目的。子貢憑其分析國際形勢的才智，藉借三寸不爛之舌，取得“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的外交成果。當然，子貢不比孔子理想的政治家子產，也不是專愛和平的墨子，更不是抱柱守信的尾生，但孔子可能同意這樣的結論：“微端木，魯其為田氏附庸乎？”以子

貢長才，不遜於范蠡；范致富稱陶朱公，可以推想，子貢作國際經貿，還不得心應手嗎？*

一 經營有道

前文提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第七”，“貨殖列傳序”分別記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賈；既學於仲尼，退而仕于衛，鬻財于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可見子貢在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間，找到了一條成功的道路。具體說來，便是從事貨物販賣以謀利。他能够捕捉商機，持人棄我取，賤入貴出的經營策略，從而達到了亦官亦商，亦儒亦商最高的境界。也可以說，子貢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官一體的儒商。他下海的勇氣和魄力，遠見令人佩服之至。但我更傾向于子貢之所以選擇亦官亦商，是懷着“有博施于民而濟眾”的理想，也是懷着弘揚老師的絕學，發揚老師的志願，身體力行老師的學說。從政，是實踐老師政治理想，慰藉老人周游列國，行教四方，感嘆：“吾道不行，知之矣”傷感的無奈與心酸。經商，是為了“以身證道”，讓老師學說得以更好的傳播，證明老師學說的功用。“德潤身，富潤屋，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豈不是子貢的寫照！

一 倫理實踐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科技的戰爭，有人提出“算術即戰術”的說法。經商該知道戰術先於算術。其實，中國兵家所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籌算就是商業詞語。不過，人際關係上，更要重倫理，才可以作為儒商。

子貢的倫理標準，不僅使夫子滿意，還超越孔子的教導。子貢問孔子說：“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回答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不僅是口號，子貢實在作到。

子貢在子路去世後，便擔起侍奉老師的責任。子貢探望病中的孔子，老人正在拄着拐杖在門口漫步，看到子貢說：“賜，汝來何其晚也。”這話表明老人如深海夜行的孤寂心，看到前方的燈塔光芒而發出的欣喜之聲，也表明了老人對這位自己讚為“瑚璉之器”的弟子是如何的愛，如何的期待。因嘆而歌，高興得唱起歌來，悲喜涕下，後七日乃卒。

孔子弟子三千，人各在忙於自己的事業和理想，而子貢有幸成為陪伴老人走完生命旅程的人，可見他對夫子的真誠。如果子貢與孔子的故事，到此就告一段落，已足夠感人了。可是，另據記載：孔子崩逝三年之後，門人各自收拾行囊，預備離去，入揖於子貢；相向失聲而哭，然後各人分別回家。大家去後，作過總理的子貢，回到墓地，在墓旁的小苦茅屋中，又獨居三年，才依依不捨的離去。孔子的門人中年齡長於子貢的有十一人，小於他的更多。案：揖禮在三代之禮中，屬上行之禮，受者無須回禮，表明大家對他的尊重。這是說，孔子門人弟子守孝三年，而子貢守孝達六年之久。比自己父母離世依禮守墓的期間倍長，有多麼的重情重義。今天的人還好意思比嗎？他應該比其他少顯貴的同学更有理由早回衙門辦公，或忙着開店營業，該更看重時間價值；而他作到了又多了守喪三年。多麼值得稱讚！

作為一名商人，子貢無疑是成功，盡管他“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似乎并不够圓滑，但是，“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對於子貢的人際關係能力情商之高，連夫子也自嘆弗如。

子貢如果在今天當政，無疑將實行儒家的理想，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學之道”。不過，儒家學者如朱熹等人，誤把“格物”解釋為“格求物理”；其實，那與以後的思想路線沒有多大關係，近於斷章取義。尋求其本義，應該是“格拒物欲，以致良知”，才可以逐步達到正心，修身的境界，也就是天下大同。

孟子評驚重大的歷史人物，期許伯夷可廉頑立懦，伊尹可覺民任重，柳下惠可寬鄙敦薄，但天下不可缺少的是孔子這樣的聖人：“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孟子“萬章下”）伯夷就是不戀王位，反戰，不食周粟的孤竹君長子，被作為清潔的楷模。伊尹是輔佐商湯立國的宰相，後又輔佐三位商王，是敢為任重的範式。柳下惠是魯國的賢大夫，為寬厚仁和的典型。孟子稱孔子“聖之時者”，就是說孔子能夠不拘泥成規，因時制宜，能建立有條理始終的完整系統，可算集大成者。子貢雖不能列入“聖”的階級，但他對於儒家的支持發揚，實踐，實在功不可沒。

*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宴，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

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

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以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

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見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

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

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賈。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借鑑貨殖成功與實踐

寫歷史的人，就得秉筆直書，沒有義務，也不能把歷史人物，化妝或化裝成動人的小說人物形象，給人放到廟裏頂禮膜拜，或吸引人流眼淚。所以如果偶有不理想的人或事出現，有時讀者所喜歡的人物，也會有些不願意看見的毛病，也只好對不起，不能要求史家給擦胭脂抹粉。

英國清教徒的軍政領袖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作了護國主，威赫一時。找當時的名家來給他畫肖像。他真把“醜話”說在前頭：“我要你照我本相來畫，臉上的皺紋殘缺和痣，都畫出來，不可加以美化修飾，否則我不給你錢！”其實，真正的“信史”很難尋得。有話說：“歷史是得勝者寫的。”中國的史官記歷史，皇帝都不能查看，為的是給執筆人減輕壓力，給後代負責講真話。儘管如此，史官也是人。他儘量客觀，真實，客觀，不故意逢迎，已經很難得了，但人的好惡總無法避免，影響其觀點。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所說的：“人不能超越他環境的影響，像不能跳過自己的影子。”也是實存的問題。

司馬遷是傑出的史學家，但不是經濟學家。他作的“貨殖列傳”說：基於人想生活得好，就產生經濟行為，是一項基本事實，對於“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雖然不贊同，也沒有辦法：如果誰想批判道德標準，沒有誰可攔阻，可是那根本就不屬於史家的範圍。“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那是自然的社會現象。

英國智者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說：“歷史是許多的個人傳記。”又說：“歷史的紀錄，是英雄和營帳。”平民的從出生到死，很少引起史家的興趣。

一般的歷史，多是君王將相，營帳沙場殺伐的記錄。太史公“自序”中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予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可見司馬遷關心社會各層面，記錄人民的生活狀況，超越存在於那個時代的史家。

史記“貨殖列傳”是中國第一篇工商業名人傳，也是世界第一。篇幅不很長，所以不能詳細記述，但其著者司馬遷，是有名的專業史官，其內容經過他稽考查覈；也可能有他父親太史令司馬談的資料，所以可信度頗高。既然其所記是真人實事，從其中可以歸納出經營之道，雖不一定足為致富祕笈，但“取予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希望讀者是古今智者，相信可資參考。

貨殖是商業活動。歷史上有個商代。中國確實的記錄歷史，是從商代開始的。從考古發現，商代始有相當完整的文字，有青銅器用，有青銅的貨幣。這些都是商業的必需條件。很有意思的是，在其644年的存在中，遷都十四次之多，大都在現今河南或附近地區。司馬遷說：“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

由此史家相信：商，不僅是朝代和屬地，也是作為“商”人的開始。人民從事農，虞，漁，工各業，但很不容易達到自給自足，所以人不能但顧自己，必須有互助和交易，以滿足其生活上的需要，是無法禁阻的。“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商人作為群眾的一部分來看，他們不一定是特殊高貴的階級，其行為可能達不到所期望的標準；但“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從小本經營看是如此，大企業何嘗不然？政府不應該歧視他們，以為有商必奸，推行重農輕商政策，限制他們的經營，或與民爭利。司馬遷說：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這樣的進步思想，多麼完整的工商政策，發展工商業，真使人佩服：就是順着人人追求合理利潤，改善自己生活的傾向；因勢，利導，培訓之外，還有整齊，就是規範組合。他並且舉齊國，越國為例，說明民富才可以國強。所以鼓勵發展工商業，是極重要的正確國策。

一 營商經國

營商的道理，可以用以經國。陶朱公(范蠡)幫助越王勾踐，雪恥復國之後，長舒了一口氣，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范蠡是絕頂聰明的人，看出興國和興家的原則一樣，施行以後，得意成為首位鉅富。“天下治生祖白圭”，其人敢誇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這位首創工商管理學院的財閥白圭，其學院的收生條件那麼高，先得兼備智，勇，仁，彊才夠入學資格，招生成為真正的問題，那麼好的天才，大概可以不必入學了，也就難怪其校友至今不多。可惜，中國過去常是“學而優則仕”，經過科舉取士，得到的是會寫一筆宮體字，作八股文章，秀才，舉人，進士，就挨年資，爬官階，得蒙天眷，成為政策制訂的人，並不能保證可以經國濟世；至少該考慮“商而優則仕”，讓智商高，品格高，清廉的企業高級執行人員參政，或能有更好的績效。

美國的當政者常有個習慣，任用成功的大企業主管，轉業作為部長級領導，根據紀錄和口碑，大致作的還算成功，也較少明顯的貪污事蹟，比起油滑的政客，或流氓軍閥好得多。這是值得考慮的。

二 掌握資源

司馬遷旅行考察很多地方，博訪周咨，知道致富要靠賴天然資源。周人白圭，善於投資物產，成為大企業家。魯人猗頓，本是窮士，以製造販賣鹽鹼致富。邯鄲郭縱，接受從埃及或中亞傳來的新科技冶鐵，不知是銑鐵或熟鐵，也因以成鉅富。烏倮經營畜牧，不僅發達，還能夠“商而優則仕”，得秦始皇帝封君，類似顧問之職。秦滅諸國，移虜民到邊遠地區，滅趙時所虜，遣送到巴蜀的卓氏，在汶山開發鐵礦，鼓鑄鐵器發達；滅山東時，虜民程鄭，梁地的虜民孔氏，他們背井離鄉，也因開發資源，冶鐵致富。復有一位巴蜀卓家名清的寡婦，世代擁有並開發丹砂礦，供藥用及染色；秦始皇帝還為她修築貞節牌坊。這些都是因不肯任貨棄於地，而開發物產獲得鉅額財富的。人要創造利潤，但不能創造資源，必須得張開眼睛，低下頭，尋取可用的資源：有時得捨近求遠，像卓氏一樣，不跟別人爭取會近味遠。在工業上，還得懂得遠市廩的方便不要緊，接近並擁有資源，保持原料不至於匱乏，是更好的戰略。

三 知人善任

司馬遷游歷閱人甚多，並加以分析，認為人性與地域和氣候有關。他沒有提供科學依據，而且時代變換已經那麼久，條件今昔不同，已經無從考究了。不過，任用人才，關係事業之成敗；才致政舉，人亡政息，有足夠的案例可以支持其斷語。“貨殖列傳”又記載戰國末，或西漢時刀間的故事：“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由而盡其力。”這是刀間用人惟才，不歧視無學無位的人，讓奴僕們去自由發展。當然，不是所有的奴僕都是可信任的，也不都有所需要的才具；知人是重要的，有些帝王信任宦官，或類似只知道逢迎的親信，導致衰亡。但如漢武帝，任用衛青，霍去病，超越內資限制，不問出身，能夠成大功，立大業，正是因他的知人，敢於用人。親信可用，但不能惟親則信。能夠有度量，讓他們有財而不恃財驕傲；結交官府，而不被染上流行的貪腐文化，勾結為惡，是很難得的，必須志節之士才作得到；先有這樣出身微賤而能夠偉大可信的人，不勞自己操刀，就因善於用人而增加財富。

中國有長久行之有效的考試制度，以文取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這對於維持民政系統穩定固然是好，至於“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是社會流動，知識分子向上的好辦法。但行之以久，不能免於僵化。所以用推薦取人才的方式，經考驗識別，更為可靠；因此“刀間模式”可用作雙軌的補充途徑，只是該有考核，不要陷入用人惟唯私。

司馬遷以為致富的途徑，“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也就是陶朱公的經營致富之道：“能擇人而任時”。從任人說到“任時”。

四 審時度勢

司馬遷發現經營的途徑：“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意思說，沒有資財的，是賣力賺錢；有少許資本，就憑藉機巧；富裕的時候，則爭取乘時因勢。“大經”，貨殖的主要原則。

白圭的“樂觀時變”，就是看不同的季節，時勢，得以致富。這也包括觀察政局，例如：宣曲任家的先人，在秦亡國的時候，別人爭取珠寶，他蓄積糧食；及後，楚漢相爭，在滎陽僵持，農民不得耕作，珠玉不得為粟，人家沒有他獨有糧食為貨，就發了大財。而橋姚和無鹽氏，則投資軍事，觀政局與戰局，捐助戰爭，活得極高的利息回報。這比意大利的麥迪奇家族早了許多。當然，這還不能同現代的軍工企業相比，他們規模大，品德低，不僅製賣武器，還挑起仇恨，製造戰爭，戕害人類，該屬於另類企業。

五 誠壹致力

工商業的經營成功，是專精於一道，以開雜貨店致富的，那是晚近的事。所以業不論貴賤，都要認定自己有興趣，力之所能，專一執着，持之以恆：心有旁騖稱為“浮志”，愛好表現則是“色態”，必然阻礙專精發展。成功的人“皆誠壹之所致。”多數的人，喜歡踏前人走出的常道；也有人能夠另闢奇徑，不循常規，用心轉於作一般看不起的賤業，惡業，成為奇業，更化為企業。“貨殖列傳”中舉出些人想不到的專業，有些還傳統是躲在陰影下幹出來的，就如：掘寶，盜墓，博戲，跑單幫的，烤肉乾，販油，賣漿，磨刀劍，還有軍馬醫生，只要持之以恆，幹得久，幹得專精，都能成為巨匠，出人頭地。但看準是人的需要，千萬莫朝三暮四，見異思遷，縱然有大的才氣，只浪費時間，也不能成功。“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 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荀子“勸學”篇）荀子教導為學，需要日就月將，一步一步，堅持同一路線，同一目標；自然經營工商業，同樣的道理也適用。

六 勤儉節用

貨殖始祖的白圭，有智慧，有本事，仍然過勤儉生活：“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持同樣原則的為任公，雖然甚為富有，為當時的社會開節儉風氣。“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舉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據史載：中國的好皇帝，都是知民瘼，體民艱，勤政節用。

宋代名臣司馬光，崇儉戒奢，成為歷來的美談：

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大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喪身敗家。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司馬光：“訓子康書”）

反之，古代桀紂暴君，酒池肉林，殘暴浪費，就稱為“民賊”，他們的統治，不久就走到盡頭。今天國際上有些當政者，忽視人民的疾苦，拿納稅人的錢不當錢，任意浪費國帑，並且濫舉國債，反正自己的任期很快就過去，管他的，盡可讓後代的人去償還。那正是偷盜後人的卑劣行徑。中國世代相沿的節約良好，也是今天華僑華商在海外致富的原因。

七 品質管理

西漢時，河南的任公，以農牧起家，非常富有。不過，他獨具隻眼，不隨時尚。“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他寧可在日常生活上省錢節用，但在原材上絕對不省：人家買便宜的牲畜，他選買貴的良種。這當然為優生的緣故，也可用為製作原則，是品質管制的遠祖。

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 1900-1993)為今代品管的創始大師，他的“十四點建議”，主要原理是使用高品質的原料，可以生產好產品，而且降低生產成本。例如：縫紉機采用貴價的綫軸，工人在工作時順利，不必停機等候費時叫保養工匠來修理，減少了麻煩，既節省工時，還又製作好產品，因此，采用較為昂貴的優質原材，實際減少成本。他的理論，起初在美國沒有多少人注意，是日本人請他培訓企業管理人員，改變了日本的生產觀念，提高了品質，建立信譽，擴展了市場。日本的工業界，甚至設立“戴明獎”，幾於成為諾貝爾獎一樣受業者重視。威爾遜總統，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曾有“十四點和平原則”，戴明的理論幾乎可與其先後輝映。不過，戴明的品質管理理論，基本上與中國任公的理論相同；而任公則在歷史上早了約二千年。

八 流通運送

范蠡輔佐越王勾踐成功以後，“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他落足在陶山之南，今山東肥城縣西北，所取是那裏的交通方便，可以作為物流中心。後來“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商貿必須有道路。“要想富，先修路”，並不是今人聰明的創舉，實在是早已有之。橫貫大陸，徂徠西東的“絲綢之路”，久遠在漢代以前就已經開通，不僅蔬果，駿馬畜豕，彼此交傳，器用技術，也互相流通；中國現在有的東西，名稱凡冠名“胡”字的，如：胡椒，胡瓜，胡蘿蔔，胡琴；和冠名“番”字的，如：番茄，番椒，番石榴；以至後來簡直稱“洋”的，如：洋蔥，洋火(火柴)等，都不是中國原來的土產。繼有絲綢和茶馬古道，更有海上絲路艘船帆船運輸，東西交通，促進繁榮和平發展，成為人類智慧發揚的光榮實績。至於思想的交通，和文化的交流，對於人類社會的福澤，只要張開眼睛，就是能夠清楚看見的事實，用不着在此多說。

九 行德愛人

“貨殖列傳”記載：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也。”真正堅實，耐久的成功，必須是信基於愛，也就是時時想到別人，不要自私。勾踐敗於吳國以後，回到越國，十年生聚教訓，體卹人民的困苦；用范蠡計然的話：“關顧不乏，治國家之道也。”於治國是如此，興業治家也是如此。“仁民愛物”是儒家基本的理想。基督的金律：“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太七:12)如果企業不照顧好其組織的員工，政府任官僚貪污腐敗，奪取人民的錢財納入自己的私囊，不照顧好人民，以致百姓絕望，想“時日曷喪，吾與汝以偕亡”，誰還樂意愛那樣的企業，“以廠為家”，或愛那樣的政權，而聽從那樣的獨夫呢？

1930年代經濟恐慌，美國實行社會安保制度(Social Security)，是資本主義國家關懷民生的良例。而後，經濟復原，工商業復蘇，國力因富而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支持盟國巨大的戰耗，獲得勝利。美國以“拯救世界”自豪。戰後又協助歐洲的重建，並且不忘推銷美國生活的方

式。歐洲國家，也多進行不同關心人民的制度；惟有德國不甚積極於推行社保，其理由是那會養成人民倚賴貪惰的傾向。

耶穌在世傳道，遇到人問祂首要踐行的原則。其實，猶太人歷代相傳的律法，已經指出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一〇：27）“愛鄰舍如同自己”，正是“天涯若比鄰”，與儒家社會主義“大同”理想相似；幾於相同。當然，大家都已經知道，“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不是指公社生活，廢除傳統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而是講人類該成為一個和樂的大家庭。因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已經悄悄的過時，證明不是正確的發展之道，成為不必要的追憶；至於甚麼文革破舊，也幸成往事。人類基本上需要耶穌基督的國度降臨，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10）“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賽一一：9）阿們。

史記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倫，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纒，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枳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

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斂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顧不貲，治國家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好廢舉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穀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而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却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厄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犍，犍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惟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

險，惟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不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伎，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羶不馴，平陽好均，自全晉之固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刁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秦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无林澤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无山川之饒，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之饒也。在楚夏之交，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臨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多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无饑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无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无凍餓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无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田，若千畝厄，萬，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时无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无所比矣。是以无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

之，奸富最下。无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
什則卑，刺綉文不屠牛車千輛，僮手鹽旃席千具，其後世得觀擇焉。蜀卓氏之遷，沃野，下鐵山鼓鑄，亦治鑄，遷孔氏南陽。大
如商，漿千甌，羊千斗，羔羊亦人所富者，令獨夫狹臨邛，大喜，即鐵冶為業。秦伐魏，魯人獨愛貴，然愈益任之。織事
其牛千足，漆千皮，此賢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魯人獨愛貴，然愈益任之。織事
革千石，裘千皮，遷卓氏。卓氏見虜略，此地狹臨邛，大喜，即鐵冶為業。秦伐魏，魯人獨愛貴，然愈益任之。織事
斷廉賈千里之中，賢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魯人獨愛貴，然愈益任之。織事
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魯人獨愛貴，然愈益任之。織事
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游諸侯，因通商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獨愛貴，然愈益任之。織事
鼓鑄，規於織治起，唯富數千。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學事
尤甚，以其故多去，唯富數千。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學事
鄰魯之所患也，起富數千。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學事
人得其力，甚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楚漢相爭，奢約，非田畜所
而富家道倉吏。秦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封
為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封
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身不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
出弗衣，食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
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
君行從軍，賞貸子錢，子錢家以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惟無鹽埒，亦
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亦
關中。關中富商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用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
鉅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用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
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
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織嗇筋力，治生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
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
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邳
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家比一都
觀之，富无經業，則貨无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
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
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遠矣！”

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无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

司馬遷，字子長，今陝西韓城人，生於公元前145或135年，卒年不詳。父司馬談，也曾任史官。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歷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他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膽識(報任安書)，創作編撰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一部長達三千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武百祥惟同為記

在十九世紀的美國，人口向地廣人稀的西方發展，尋求致富的機會，隨之形成商業和文化的遷移。在中國，隨著民國的建立，滿洲人不僅失去了對中原的統治，連老家也失去了；大量的移民，湧向地廣人稀的東北，去尋求發展創業，俗稱為“闖關東”。

有個基督徒武百祥，原籍河北，早年赤手空拳進入東北。那時，貨幣制度也隨著時代改換了，銀兩，銀圓變成了紙幣；官家隨手印刷方便，人民攜帶容易，只是有一個缺點：流通日久，就由陳舊而破爛。當時支票還沒有通行，破舊的鈔票，實在不受歡迎。這樣，有一種行業就應運而生。吳百祥作的就是這種生意：紙鈔換銀圓，舊鈔換新鈔，然後去銀行兌換，從中賺取小利。以後，就負販適應寒冷氣候的三塊瓦皮帽子，也賣線針織的襪子；因為傳統的中國襪子是用布縫製的，所以那種襪子就稱為“洋襪子”。武百祥見這種簡單手工業並不難作，後來積存了些資本，就從販賣進而製作；買了幾部針車，動員家人在家自織襪子，拿到街市上兜售。由於他作事誠實認真，又肯觀察研究，織成的襪子比別家出品好，穿來也更合腳，所以頗受歡迎，生意也就越作越發達。

武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篤信神的應許，對事奉神也極為熱心；每逢主日，必定全家休業聚會，不作買賣；凡所得的，必定獻上十分之一。他原來所受的教育很有限，但甚有聰明和才能，蒙主恩眷，生意擴展很快；不到二十年，自己在哈爾濱建立工廠，生產針織品，衣物，肥皂，化妝品，日用百貨等，規模闊敞；還建了“大羅新百貨公司”及“同記商場”，四層鋼骨水泥的大廈建築物，全是由他自己繪圖設計建造。在第四層樓上，是禮拜堂，可容一千多人；自己延聘牧師，成立教會。每至主日全體停止營業，集合員工敬拜主；他自己為全部的詩篇譜寫曲調歌唱。不用說，這是真正的自立，自養，自傳教會。他又辦了中學一所，小學一所，入學的學生免收學費。到了主日，他自己徒步率領成群的學生，到教堂赴主日學及聚會，真像是走在羊群前面的好牧人。家庭，學校，教會合在一起，是好的見證，也是美國移民時代的良好模式。

武百祥事業大了，上下員工有四五千名，經理五十多人，常派人赴歐美考察，增廣見識，改進業務。因為樹大招風，到了“滿洲國”期間，政府想要他出來領導工商業；他拒絕了，由經理一員作代表來應付，竟被舉為商會會長。武自己並不求名，自奉甚為儉約，一套中山裝，可以穿上十年不換；自己安步緩履，從不坐車；妻子操持家務之外，也要親自搖紡車來倒紗。正如周代的富商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史記“貨殖列傳”）堪稱基督忠心管家。但對於傳道人，則儘量接待，以為是神的使者；凡信仰純正的神僕，不視宗派差別，一律款接，“接待這樣的人...與他們一同為真理作工”，並且臨別還有饋贈，“幫助他們往前行”（約叁：5-8）那時，教會還沒有流行“差傳”的名詞，可以稱為“本地差傳”。

凡屬於主的事工，都盡力協助；他從來不只看見自己的教會小圈圈，是由於有遠大的眼光，廣闊的襟懷，對主身體的真理深有認識。有一次，某宗派教會向政府申請到一塊墓地，有數百畝之大；他就往見負責的牧師，曉明基督徒活着也不該分宗派，死後的遺體哪還好有差別？他出資建造周圍的磚牆，用了當時的幣值八千元之鉅，好讓所有信徒死後有葬身之處，等候主再臨復活。這好像是對教會分門別類，大建宗派“圍牆”者的諷刺

和教導。至於眾教會協合的事工，在眾肢體奉獻之外，所差的他都全部負責，有時高達幾千幾萬元之多，也毫無吝色。

在當時，中國用汽車的人還不多見；外國宣教士僅少數有自備汽車。吳百祥衡量實際情形，就說：“洋人牧師有坐汽車者，吾國牧師何可出無車！”因此，為教會牧師建造新馬車一輛，出入代步。那時，中國教牧多從西差會領薪水，每月僅在十幾元，或二十元，有的少至八元，跟宣教士的廚子或佣人差不多；小學教員月薪二十五元，中學教員四十多元。這是一般的待遇標準。但武百祥聘請丁立美牧師為會牧，絕不是同於為洋人僱傭，而是奉獻銀圓三百元，並且為會牧建新式住宅，有暖氣設備，有佣人二名，以免牧師之勞。可惜，丁牧在那裏任期不久。這可能由於二人性格不合，吳或有東家與西賓的觀念；丁立美則被宣教士譽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徒”，教會視之為當世保羅，而品性高潔，不為物質所役，固然顯得可敬，少說也不免有些傲氣。據說，當分手的時候，丁告訴武說：“你不過就是幾個錢嘛！”可見是不歡而散。

但武百祥到底是個謙虛而真誠的人，待人寬厚，慷慨有愛心。有一位任職多年的老牧師，晚年雙目失明；武奉獻三萬元以贍養其老。這是從沒聽說過的數額。至於他每年的十分之一奉獻，積達數萬元，當地教會足用有餘，中國也沒有教會機構可以稱為“神的倉庫”，想到別的教會和工人的需要，統一管理分發；他就詢察外地主的事工，有甚麼需要的，不分南北，不問遠近，不管識或不識，更絕不待人來上門索取，隨從聖靈引導，逕行寄去奉獻，而且不求顯名，從不挂甚董事等名銜，更為可取。說到他助人施捨為善，則是不勝數計了，真可以稱良善忠心的好管家。只是不知甚麼原因，他沒有辦過教會傳播事業，也沒有興辦大學；雖然他有那個力量，說不定是沒有相知可託的人，也許是其他原因。或許是受當時流行的“屬靈派”思想影響；因為那時代背景，有“社會福音”流行一作社會事業，慈善事業，教育，青年會等大衆事工，代替傳福音。所謂“基要派”則拒絕關心社會，以為不屬靈。當時的中國教會界，正有“戴德生路綫”及“李提摩太路綫”的區分，使信徒“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可惜“二分法”，頗違背真理。其實，基督徒可以跨越這不合理的人為界限。

最特出的，還是武百祥的基督徒化經營原則。事業大，用人眾，賺錢多，利潤該怎麼辦？每到年底，結算全年營利總額，稅是要納的，但向神“當納的十分之一”，要先取出來，然後分為三份：一份歸勞工，一份為營管，一份給資方。每人所得的數額，並不全是現金，而是有部分為公司股票(20%至30%?)。這樣，事業是大家的，全體員工都成了股東，也都是勞工，作事自然也更為認真。不過，就是這麼智慧合理的事，工人待遇也好過一般的人，也不是每個人都能領會效法，還有極少數的一小撮人，不喜歡這種作法：唯一的原因是創新。吳百祥的理想超過他們前頭四五十年。

卡尼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說：“人死而富有，死而蒙羞。遺產億萬，為子孫患。”吳百祥顯然沒有名列世界五百強。雖然，他的名字音似“五百強”，恐怕他連這個名詞也沒聽說過；更是無法跟現今的跨國企業相提并論。由於所受教育不多，沒出過國門，更不能如卡尼基閱讀群書，著作遺世。但他憑主賜的天賦曉悟，知道企業的經營發達，不是單靠有資本，所以不該有階級鬥爭；他的企業結構理論，是勞，資，管，三方協和，如鼎立三足合作。營作協和，利潤分配，也是三方共享。

以後，政局改變了。武百祥用不着滿載遠逃；資本家成為清算鬥爭的對象，有的下場極慘。武百祥的遭遇如何，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在大風暴中，他也曾遭受相當嚴重的衝擊；有的說，他只受到輕度的為難。據

說：在被當作“資本家”對付的時候，熱熱鬧鬧的盛大群眾集會上，並找不到他剝削勞工的罪證，指控不能成立。有大膽的群眾，還為他說話，認同吳與他們同一階級。武家的生活同大家一樣的簡樸，多少年來的見證，在眾人面前，是一本敞開的帳簿，並沒有為自己積財；他也沒有參與政治的事，更沒有勾通外國，作甚麼帝的特務。實在說，他秉性耿介，不會趨附，還似乎多少會有些“反帝”的傾向。不過，他大概還不到被列為“紅色企業家”的資格。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把一切的企業都交了出來，符合了當時的政策。武百祥其人的下落如何？他肩上背著一個褡褳，內中是聖經，聖詩，簡單的日用物品，和一些乾糧，飄然走向山僻的村莊，傳揚福音去了。以後，再沒有人看見他的身影。到現在，也沒有聽說這位真正的“社會主義企業家”的出現。

這些日子，哈爾濱這名字和形象，倒還聽說過，見到過，那是國際有名的冰雕展出：許多精美可觀的建築物，幾乎是整座城市的景物。但那都不能存在多久，不等夏天再來，就都消化了，過去了。但我們都知道，吳百祥的工作，總不會消化。

汽車大王亨利福德(Henry Ford, 1863-1947)說過：“偉大的人看出時代的需要，並能供應那時代的需要。”吳百祥可以說是那樣的人物。因此，他值得人長久懷念。

中國人有句俗語說：“人不自私，天誅地滅。”武百祥的成功，正在於他的出類拔萃，絕不自私，總是想到別人。這與基督教信仰有關：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二：4,5)

在許多年前，一位認識他的老牧師，提到他的名字和傳奇般的事蹟。我也遇到過在他公司工作過的人，連不曾直接認識他的哈爾濱人，也以武為傲，傳誦他的聲譽。又是多年後，我在火車上遇到一位乘客，人看來莊正安詳，說是哈爾濱人。問起來，早年在武百祥的學校讀過書，跟他上過主日學。可見他的影響是深遠的。

但現代繼起的武百祥在哪裏呢？

今天記念武百祥，記得其人“大同”的思想就夠了。

中國有自己的中醫傳統，有自成一家的診治理論和實踐。其實，中國人應該從自卑的陰影下走出來，也該有“中商”，經營方式不同，並非就必然是落伍。正如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社會主義被遺忘，有些西方奉為經典的理論學說，也漸被淘汰，歷史證明中國人的智慧，並不因古而衰老死亡。加利利湖邊的教訓，歷久彌新，會成為新世紀的春雷，帶來滋潤萬物的時雨。

**

本文初撰寫時，據口述，誤“武”為“吳”。今見多項資料，予以更正。

武百祥於解放後，曾被委為政協之員，並領袖多項公益事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期間，遭受迫害，於1966年九月殉道。1997年，獲得平反。是遲來的公義，在那年，是他百歲誕辰後一個月。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